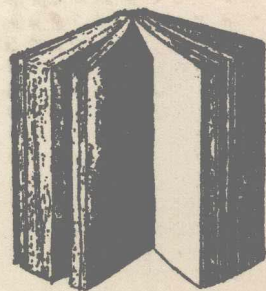


学术序跋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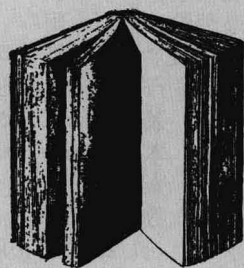


施惟达 主编

 云南大学出版社

学术序跋集

施惟达 主编



 云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学术序跋集/施惟达主编: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8

ISBN 978 - 7 - 81112 - 596 - 2

I. 学… II. 施… III. 序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79585 号

学术序跋集

施惟达 主编

责任编辑: 李兴和

装帧设计: 刘 雨

责任校对: 段建堂 何传玉

出版发行: 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 装: 昆明市五华区教育委员会印刷厂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1

字 数: 306 千

版 次: 2008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1112 - 596 - 2

定 价: 48.00 元

社 址: 昆明市翠湖北路 2 号云南大学英华园 (邮编: 650091)

发行电话: (0871) 5033244 5031071

网 址: <http://www.ynup.com>

E-mail: market@ynup.com

前言

施惟达

序跋之传统，源远流长。

古书的编著者在成书之后，往往要写一段说明性文字，置于书之前或书之后，称为序。序者，叙也。序有两类：一类对他人的作品作序，介绍评论作家作品，以及阐述自己的主张等；一类为自己的作品写序，陈述写作之经历与用心，作品的谋篇布局等。总之，正文所没有而又很有意思或很需要说明的一些内容，往往通过序说出来。后来又把放在作品首端的称“序”，放在作品末尾的称“跋”。现代更演变出前言、后记一类的文体，其实功用都大体相近。

对于一部书来说，序、跋（前言、后记）有时提纲挈领，可窥全书之价值；有时交代背景，可知作者之意图；有时叙写甘苦，可启生活之感悟。好的序跋，常常就是一篇好的文章，可读，耐读，比之洋洋数十万字的书来说，别有一番读的趣味。

2008年是我们云南大学出版社建社20周年。20年来，我们社大小共出版了2500多种图书。这2500多种图书，放在一起足够装若干车。古语用“学富五车”来形容知识之渊博，以“五车”为标准，我们已大大超过这个数了，足见今天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要全面地展示这些书，显然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但是，展示其中的精华还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如何展示？经过大家讨论，觉得选一部分有代表性的序、跋（包括前言、后记）结集成册不失为一种方式。

于是有了这部书。

云南大学出版社是一学术性出版机构。“弘扬民族文化，树立学术品牌”是

我们的出版理念和一贯追求的目标。我们在选编这部书时，也努力突出这一点。书名以“学术”冠之，是所望焉。

所选序跋大致分为三类：哲学、文学、艺术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历史学等。每一类中，又按出版时间之先后顺序编排，祈读者鉴之。

2008年5月

目 录

前 言	施惟达 (1)
《楚骚：华夏文明之光》前言	殷光熹 (1)
《语言文化论》后记	陈保亚 (4)
《艺术的起源》(代序) 一个难度很大的研究课题	叶秀山 (6)
《中国古代文化与日本》序	钟敬文 (9)
《文化语言学发凡》自序	张公瑾 (19)
《刘文典全集》跋	张文勋 (21)
《叙述的力量：鲁迅小说叙事研究》后记	谭君强 (23)
《守望精神家园：人文科学论纲》(代序) 一个自然科学工作者 对人文科学的期待	王绶琯 (26)
《张文勋文集》前言	施惟达 (36)
《中国文明透析》小序	王 蒙 (46)
《家族主义与中国文化》序	杨知勇 (48)
《戏剧本质新论》后记	吴 戈 (50)
《赵仲牧文集》前言	施惟达 (52)
《思辨的想象》前言	聂振斌等 (57)
《论中国大学与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序	张楚廷 (61)
《自由与秩序的困惑》序	汤一介 (63)
《找回大学精神》(第三版) 自序：“有而不在”的大学精神	董云川 (69)

《巴别塔的重建与解构》后记	李 河 (73)
《对话诗学》序	宋聚轩 (79)
《枫林杂思》自序：写给谁看	张尚仁 (82)
《现代化视野下的中国教育（1862—1922）》序	孙培青 (87)
《中国近世白话短篇小说叙事发展研究》序	巩本栋 (92)
《中美戏剧交流的文化解读》序	余秋雨 (103)
《东陆文化丛书》总序	卢云伍 吴 松 (106)
《中国戏剧的早期形态》序	王小盾 (109)
《阐释与重构》序	董学文 (116)
《彝文化论》序	何耀华 (120)
《民族心理与民族意识》作者自述	熊锡元 (125)
《云南民族住屋文化》后记	蒋高宸 (127)
《少数民族习惯法研究》（序）民族法研究的理论意义	徐中起 (130)
《基督教与少数民族社会文化变迁》前言	钱 宁 (136)
《人类学与西南民族》前言：面向 21 世纪的中国人类学	王筑生 (143)
《照叶树林文化之路——自不丹、云南至日本》后记	[日] 佐佐木高明 刘愚山译 (155)
《道教与云南文化》序（一）	卿希泰 (158)
《藏客》后记	李 旭 (161)
《云南民族戏剧论》序	陈 多 (164)
《云南民族音乐论》后记	周凯模 (169)
《民族政治研究丛书》总序	吴 松 (177)
《从云南到阿萨姆》后记	何 平 (181)

《民族学通报（第一辑）》发刊词（前言）	林超民（184）
《礼物与商品》自序	[英] C. A. 格雷戈里 杜杉杉等译（187）
《影视人类学原理》（中译本）再版序言	杨 慧（190）
《20 世纪中国民族家庭实录》总序：串起世纪民族文化之链	高发元（195）
《西南边疆民族研究》序言	方 铁（200）
《滇藏川“大三角”文化探秘》再版后记	木霁弘（206）
《游客管理：世界文化遗产管理案例分析》前言	[英] 迈拉·沙克利 张晓萍等译（221）
《云大早期的历史文化》前言	木 芹 木霁弘（223）
《彝族俐休人民俗》后记	李国文（232）
《中国民族村寨调查丛书》总序	高发元（237）
《云南民族民间戏剧概论》跋一：感谢机缘	王胜华（242）
《民族旅游的人类学透视》序	彭兆荣（246）
《休闲研究引论》前言	[英] 克里斯·布尔等 田 里等译（249）
《云南民族舞蹈史》后记	石裕祖（253）
《社会文化人类学初探》代前言：从三个术语的辨析看中国民族学的发展方向	和少英（259）
《茶马古道上远逝的铃声》后记	马健雄（270）
《文化生态与物质文化》前言	尹绍亭（273）
《外国经济思想通史》序	陈岱孙（275）
《滇云历年传》校点前言	李 挺（278）
《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弁言	方国瑜（284）
《考古与古代史》自序	蔡 葵（286）
《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前言	吴承明（289）

《中国城市土地经济分析》序·····	苏东水 (294)
《走向 21 世纪的东南亚与中国》前言·····	贺圣达 (298)
《贝币研究》序·····	李 挺 (301)
《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前言·····	肖 宪 (304)
《从部族社会到民族国家》后记·····	刘鸿武 (308)
《云南大学中国经济史研究丛书》总序 ·····	丛书编委会 (312)
《云南抗日战争史》(增订本)前言·····	孙代兴 (317)
《云南工业史》序言·····	陈征平 (320)
《中国古代“富民”阶层研究》前言·····	林文勋 (324)

《楚骚：华夏文明之光》前言

殷光熹

《楚辞》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古代诗歌进入了文人自觉创作的时代。屈原既是“骚体”诗的创始人，也是我国第一个写长篇抒情诗的文人诗人。他的爱国思想、远大抱负、高尚情操和献身精神，历来为人们崇敬。两千多年来，“屈原精神”一直激励着、感染着世世代代的中华儿女：无数仁人志士、英雄豪杰，不断从中吸取精神力量，导演出一幕幕动人心魄的历史新场面；多如繁星的历代作家，纷纷追踪屈子遗迹，重奏楚骚遗响，谱写出众多优秀诗篇，真可谓“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学者对《楚辞》的研究，相继不断，成绩卓著，以至成为一门专门学问。可见，屈骚影响之巨大和深远，是难以估量的。记得业师姜亮夫教授曾说过这样的话：“要是没有屈原的作品，就不会有我们后代文学这个发展，或者说我们后代文学的发展不会是我们现在走的这个路子。像汉乐府、唐人律诗、宋以后的词曲等，可能是另外一个路子。至于什么路子就无法猜了。”（《楚辞今绎讲录》）更令人鼓舞的是，屈原的影响已扩大到全球，他的名字已被列入世界文化名人的行列，他的作品已成为全人类的精神财富，随着国际文化交流的增多，屈原和《楚辞》的影响会越来越大。中华民族为有这样一位伟大诗人而感到光荣和自豪！

马茂元教授在《楚辞研究集成·总序》中说：“历史是割不断的。任何研究工作都有它的继承性、连续性。前人步武的终极，应该是后继者发轫的起点。这样才能推动这门科学不断向前发展。从这个意义来说，清理、吸收和参考前人以及近代学者的学术成果，去粗取精，从而使自己更进一步向新的目标迈进，对于

研究工作者，是十分重要的。……对屈原及《楚辞》的研究，自应在过去已经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上有所提高，有所突破，开创一个新局面。”这段话既对楚辞研究工作的继承和发展的关系作了精辟的总结，又对开创楚辞研究新局面寄予殷切期望。可以说，这个“新局面”已开始出现，仅就近十年来（特别是中国屈原学会成立以来）国内楚辞研究情况来看，成果累累，形势十分喜人！在这一时期中，学术研究的活跃气氛又重新激发了我对楚辞研究的积极性，然而当我着手选题时，却遇到了困难：第一，楚辞研究的历史悠久，积累了许多成果，这是有利的一面；不利的一面是，许多较为容易解决的问题几乎都有人论证过；至于聚讼纷纭的“老大难”问题，就像是一块块“硬骨头”，少有人去碰它。第二，有关屈骚方面的第一手材料，目前，在先秦时期典籍中尚未发现；两汉时期有一些，但不多；唐以后至近现代，后人研究楚辞的论著又非常多，一般图书馆就连其中最重要的部分也难收齐，更不要说把它们收全了。第三，楚辞研究不仅需要具备扎实的国学根底，还需要有广博的知识，这就是说，已基本具备的条件还需要巩固、提高、深化；薄弱环节、不足之处需要补课、钻研，或请教师长，或与友人研讨。总之，就个人研究楚辞的条件而言，受到诸多限制。好在有师友的支持和鼓励，特别是1979年教育部委托杭州主办的楚辞进修班，我有机会被选送到姜亮夫教授门下受业，获益匪浅。回云大后，我即用部分精力研究楚辞，并且给研究生开了专题研究课。

在治学上，我赞成“在务实的基础上创新”。尽管做起来有困难，我还是努力去实践，例如先从基础工作做起，认真阅读《楚辞》原著，参读各种注本，写出心得体会；在此基础上广泛阅读有关文献资料和古今学者论著，经过反复酝酿、构思，然后选定题目。或考察辨析，去伪存真，有所发明；或抓住关键问题，层层剥笋，有所开掘；或突出重点，加强论证；或系统论述，比较分析，形成系列；或全面追溯，阐幽探微。其间如有同于旧说者，也尽己所能，进行补充、阐发和论证；如有不同看法，力求中肯、公允，言之有理，持之有故；遇疑而不明的问

题，多方求证，使不太明朗的问题得到回答；如有新说，力图将理由阐述清楚，具有说服力。当然，这仅仅是笔者的主观愿望和追求，有待实践的检验。

本书主要内容可以归纳为五个方面；一是对屈原思想的研究；二是探讨楚辞本身的思想内涵和艺术形式；三是“二招”（《招魂》、《大招》）专题研究；四是论述唐以前楚辞研究史；五是楚辞的“影响”研究。当然，上述内容的研究，范围很广，只能根据个人的实际情况，有所侧重；即便如此，也并非说本书已经达到预定目标，今后还有许多事可做。

本书虽不是我研究楚辞的全部，但多少反映我在楚辞研究上的情况。一介书生，虽不足道，然报国之心拳拳于怀，特以此微薄之礼献之，此其一；二来想向前辈师长作个汇报，乞望指教；三来希望得到广大读者的帮助。

事业艰辛，冷暖自知。值此全书竣事之际，铺纸磨墨，姑写记之。

1990年4月13日

（《楚骚：华夏文明之光》，殷光熹著，1990年10月出版，责任编辑：戴抗。该书1991年获西南地区高校出版社优秀图书奖，1993年获云南省1990—1992年社科优秀成果编辑三等奖。）

《语言文化论》后记

陈保亚

本书初稿成于1988年底，补充工作延续到1989年夏。在写作和补充过程中受惠于行家甚多。语言演变的结构表述和我的导师徐通锵、叶蜚声先生及王洪君女士的工作分不开。模糊语义的研究深得石安石、伍铁平先生的指教。我曾和哈佛大学陈维纲博士多次讨论分析哲学的问题。云南大学西南边疆民族经济文化研究中心张文勋先生、李子贤先生、杨寿川先生不嫌后生莽撞，多次让我在中心发表语言文化的见解，听取意见，因此得益于国内外民族化学者甚多。我还在和云大中文系赵仲牧教授讨论语言和哲学、思维的关系时受到很多启发。云南大学中文系木霁弘讲师多次和我深入不毛，嚼着干粮在烈日或茅屋下考察和讨论民族语言文化。我的朋友周政后为本书中英、法文献的翻译和润色花了大量时间。我的学生杨海潮三番细究原稿，常和我对膝长谈到鸡鸣，对书稿的校改贡献颇多。

书成后云南大学副校长李兆同先生审阅了全稿，提出了重要的修改意见。木霁弘为出版琐事操劳甚多，常中断自己的写作，风尘仆仆、面有菜色。云大出版社戴抗女士不趋大势，为这样一本经济效益平平的书稿日夜奔走，精打细算，使我非常内疚。本书录排难度大，时间紧，云大熊长虹、李伟女士夜以继日地工作，特别是李伟女士常为音标、图表的制作反复推敲、修改，熬到次日凌晨。没有两位女士对我的工作的理解，这本书录排不下去。

谨此特向上述师长朋友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本书的民族语言资料除了我自己的调查，还广泛参考了国家民委的民族语言简志丛书。外文资料只要国内有正确译文的，都尽量采用。在此对这些作者、译

者一并表示感谢。

最后，我要提到已故美国语言学家本杰明·沃尔夫。他的语言相对论思想是我着手写这本书的主要动机。他是我因阅读而激动的先哲之一。没有他的学术献身精神和学术品德支持，我不可能在这样一种学术环境下完成我的工作。如果他不是过早去世，现代语言学、分析哲学和文化学可能会呈现出不同的面貌，而我这里的工作可能只是他的视野中的一个小空间。

1992 年底于云南大学

（《语言文化论》，陈保亚著，1993 年 4 月出版，责任编辑：戴抗。）

《艺术的起源》（代序）

一个难度很大的研究课题

叶秀山

“艺术的起源”可以说是一个永恒的论题，“探本求源”原是人的理性的一种习性，我也时常想这个问题，读一点这方面的书，但没有专门下功夫去研究；章建刚、杨志明做了大量的研究，写成这本书，它给我的印象很是丰满，材料很多，也有相当的理论深度。

看得出来，这本书的作者很强调对“艺术起源”问题不仅要从实际历史、考古材料上入手，而且还要有哲学理论上的探索和思考，这一点，我是很赞成的。

“艺术”的“起源”，不像“恐龙”的起源。世界上何时有了“恐龙”，何时又灭绝了，是可以弄清的；可是“艺术”的“起源”就不太容易弄清。倒不仅是因为“艺术”这个指称不像“恐龙”那样明确，好下定义，而且还在于“恐龙”仅为一物（物种）而“艺术”则带有“精神性”。“精神”不同于“物（质）”，“精神”“在”哪儿？世上实在找不出“精神”来，所以有的哲学家说，“精神”“不存在”，“精神”为“无”。

对世上“有”的东西，我们可以找出它的“起源”，而对于那世上所“无”的东西，我们如何找出它的“起源”来？过去我也曾经向做“艺术起源”研究的朋友们提出过这个问题，他们也都觉得需要认真思考。

当然，如果我们问：“京剧”起源于何时？我们可以有把握地回答：“京剧”作为一种特殊的艺术形式（物），形成于清乾隆年间；如果问“戏剧”的起源，就麻烦得多，扩大开来，问“艺术”的起源，难度也就大大增加。不仅如此，一

切的具体事物，我们只要下功夫，都可以弄清它的来龙去脉，但宇宙作为一个整体的“起源”，就是一个大难题；而我们哲学上常说的“无限”、“万有”（万物），同样在世上找不出来，世上没有一个东西叫“无限”，因此，它的“起源”就更难说起。

“无限”、“万有”（万物）原本是我们思想中的一种观念，哲学上叫做“本体”——因“本体”的外文为 noumenon (noumena)，来源于希腊文 νοῦς，即“思想”、“精神”的意思，此种只在 νοῦς 中的观念 (ideal)，现实世界无一物与其对应。“本体” (noumenon, noumena) 是指只在思想中才有的东西。

这样，一切精神性的东西其“起源”与其“本质”就统一了起来。我们不容易在现实时间——历史、考古中发现一个“点”，说它就在这“点”“开始”，而却要探寻“精神”之所以为“精神”、“艺术”之所以为“艺术”的根据所在，这样，求“本质”不是为其下定义，而是求“本源”，这大概就是海德格尔《论艺术之本源》这本小书的立意之所在。海德格尔说，既不是你做出了“艺术作品”使你成为“艺术家”，更不是你是艺术家才使你的“作品”成为“艺术品”，而是“艺术”使你和你的作品都成为“艺术的”（“人”和“作品”）。从这个思路想下去，从理论上说，我们并不能问谁是“第一个艺术家”，也不能问世界上什么是“第一个艺术品”，而是要问如何理解“艺术”。“如何理解艺术”是一个历史性的问题，同样也是一个现实性的问题。对“艺术”的理解，对“艺术”“本源”的理解，在“古人”的生活中，也在“今人”的生活中。

“艺术起源”之困难，还来自“人”问题本身的困难。“人”作为一个“生物”“物种”，当然有它的起源、开始，我们不能说“人”这“种”“生物”与天地共老；但“人”之所以为“人”，不完全在于它的“生物”特征，甚至也不完全在于它的社会特征。譬如，我们能比较清楚地知道“奴隶”与“奴隶主”阶级是何时分化出来的，但对于活生生的“人”，却很难加以规范。从一方面说，“人”是被“决定”的，但换一个角度来看，“人”又是“自由”的。连过去都

有“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的说法，如今的“人”，则更有多方面的“可能性”，有更多的“机会”，不是一般外在环境所能限制的。所以我们也说，“（某）人”，“不可限量”、“前途无量”等等。对于“自由”“人”，因其“无可限量”，所以也难以究其“起源”。由此类推，举凡与“自由人”相关之一切，如其“意识”、“思想”……及“艺术”，亦皆难言其“起源”。“意识”、“思想”，作为“人”的生物特征——特殊功能，当然有其生物、生理上的产生、进化、发展过程，像“语言”、“文字”等等“工具”，也都能相对清楚地确定其“起源”，而作为活生生“人”的存在方式的“思想”、“意识”、“语言”、“文字”、“艺术”……其“产生”、“进化”、“发展”等问题，就难以判断。

“人”作为一个“物种”、生物族类的存在，以自己的劳作、活动“改变”着世界的具体面貌和进程，但指导、支配“人”的物质活动的“精神”、“思想”、“意识”却并不能“物质地”“进入”物质世界，世界上此种“精神”之“刻痕”和“轨迹”只有“自由”的“人”才能“辨认”出来，“世界”只有面对“自由”的“人”、“文明”的“人”时，才具有“符号”、“象征”的意义；“自由”、“文明”使“世界”成为“艺术品”。“艺术”之所以成为“艺术”，“艺术”之“起源”、“本源”，在“人”本身。

建刚和志明的书要出版，嘱我写几句，所以就发了一点议论，很不成熟，请读者批评。

1995年7月18日

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艺术的起源》，杨志明、章建刚著，1996年12月出版，责任编辑：伍奇。
该书1999年获第六届云南图书奖三等奖。）